

笔作枪

——东北作家群的文化抗战

为九一八事变81周年而作

2023年9月18日

星期一

T11

时时歌吟以念故乡

本报记者 张晓丽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鲁迅这段话，是对东北作家群最好的描述。即便他们的性格有的豪爽刚劲，有的矜持纤细，有的温和敦厚，有的憨朴倔强。但家乡的沦陷、亲人的失散、流亡的艰苦、牢狱的生活……这些共同的情感汇聚在一起，就会促使他们高高举起抗日爱国的革命旗帜。

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马加、罗烽、白朗、李辉英、骆宾基，在这些响亮的名字之外，东北作家群中还有许多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比如穆木天、高兰、塞克、金人、林珏、孔罗荪、杨晦、于黑丁、于毅夫、李满红、耶林、杨朔、陈辛劳、姜椿芳、师田手、蔡天心、刘淑德、丘琴、刘芝明、金肇野、董速、雷加……

穆木天与高兰都是诗人。穆木天“总是热望着，像杜甫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似的，把东北这几年来民间的艰难困苦的情形，在诗里，高唱出来”，他时时唱哀歌以念故乡，写下《写给东北的青年朋友们》《又到了这灰白的黎明》《奉天驿中》等许多忧民爱国的诗篇。“高兰！我们是从血泊中生长了起来！”“真不知有多少民族战士，用他们的血与肉，交织出来伟大的民族革命的诗篇！”穆木天写诗《赠高兰》，高兰也以充沛的爱国主义激情相和着，他们将爱国的情愫和对家乡的思念，充分熔铸为一体。

塞克多才多艺，做过话剧演员、电影演员，做过导演。他是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写过描写东北生活的小说，出版过几本诗集，他最突出的则是抗日戏剧的创作。塞克先后写的十余个剧本中，有9个直接反映了抗日救亡的主题，其中《流民三千万》是他的代表作，是东北流亡作家第一个在关内出版的反映日伪统治下东北同胞生活的剧本。

杨晦、李满红等人是辽宁籍作家。杨晦的资格较老，曾参加五四运动。他的五幕话剧《楚灵王》，通过蔡国军民上下团结一致，成功保卫国都的故事，歌颂了正义事业必胜，在当时全民抗日斗争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其现实内蕴不言而喻。李满红的一生很短，只有25岁，他辗转北平、南京、长沙、桂林、重庆等地，诗集《红灯》贯穿着一个基本主题——为祖国的解放而奋斗。

在东北作家群中，有这样一些作家：他们虽然不是东北籍作家，但早年便来到东北，并在此生活了较长时间，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用作品反映当时东北社会的生活，以后流亡关内，仍然继续创作反映抗日斗争的作品。在东北作家群的行列里，理应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如17岁到哈尔滨、集翻译与创作于一身的金人，如16岁随家迁往哈尔滨的孔罗荪，还有描写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实景的于黑丁，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于毅夫的身影，巧合地出现在几乎所有东北流亡作家的生命里。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主要从事东北救亡的宣传工作和东北文化工作的组织领导。在那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对于那些年轻的东北作家来说，于毅夫不论在创作的实践还是政治经验上，都是“老大哥”。流亡中的李辉英、马加、金肇野、师田手、董速、萧军、舒群、骆宾基等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这是一群令人尊敬的前辈，他们最早感受到国土沦陷的屈辱与艰辛，并自觉开启了一项伟岸的事业，他们的名字值得铭记！

错过，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一般来说，晚降临人世，就要迟走向人生。”这句话饱含了惋惜、遗憾，常常引人叹息，但研究骆宾基30余年的宁波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生导师常勤毅讲这话时，却有些敬佩的意味在。

骆宾基，原名张璞君，吉林琿春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幼年》、小说集《骆宾基短篇小说选》、专著《金文新考》等。

在东北作家群中，骆宾基是名副其实的“后生”。及至《边陲线上》完稿，萧军、萧红等作家早已名扬上海。常勤毅说，年纪虽轻，骆宾基却有不甘落后的韧性、志气和雄心，“有月亮不摘星星”，他要闯出自己的路。

鲁迅的推荐，就是骆宾基想摘得的“月亮”。1935年，辗转哈尔滨的骆宾基，得知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在鲁迅的帮助下出版并震动文坛的消息，看到了前路：一条从哈尔滨逃亡上海，通向以鲁迅和茅盾为中心的左翼文坛的道路。

1936年7月至9月，鲁迅在日记上三次记载

“得张依吾信”，“张依吾”即骆宾基。长篇刚写完前两章，骆宾基就寄给了鲁迅，然而此时鲁迅已经重病在身，《边陲线上》与鲁迅擦肩而过，是骆宾基一生的遗憾。悲痛过后，他将书稿寄给了茅盾，自己则投入火热的报告文学创作当中。茅盾很快给骆宾基回了信：从《边陲线上》的“氛围气”看得出作者的笔力和未来，并同意介绍出版。然而，即使茅盾的再三推荐，种种因素导致出版遥遥无期，书稿甚至差点毁于战火。终于在茅盾的第四次推荐下，小说得以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命运的捉弄令人感叹，常勤毅却深信：“错过，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拿起报告文学这个战斗武器的骆宾基，旋风般追踪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描摹战争风云，创作出《大上海的一日》与《夏忙》两个报告文学短篇速写集，还有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东场别动队》。茅盾读了《大上海的一日》后，盛赞：“这样用血用怒火写成的作品，读者自能认识它们的价值。”

时少有的。

《边陲线上》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对抗日义勇军的现实主义描写。对比《八月的乡村》等作品中塑造的义勇军形象，骆宾基的描述更符合现实。小说的结尾是浪漫的：激烈的战斗中，“在灰色霾云满布的晨雾中，一杆极小的红色旗帜，插在很远的两峰夹峙深处的山尖上”，“一群人灯蛾似的，发狂地向沸腾着的人喊马鸣的山峰间，飞扑过去，提了他们的空枪筒和斧头”。作者让正义力量的代表刘强率残部与朝鲜红党汇合，继续抗日。

“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鲁迅认为革命者当如是，恰如骆宾基心中的革命者，为理想，灯蛾似的，飞扑向前。

灯蛾似的，飞扑向前

后起之秀，如何突破前者的光芒？《边陲线上》或许可以提供范本：你会在关东的大山里遇到心刚命苦的乡亲，在寒冷的东北冰河上对话好酒的俄罗斯人，在春日的原始丛林中欣赏朝鲜人蘑菇形的草屋……常勤毅说，在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中，恐怕没有哪位作家能像骆宾基那样自觉、自然地表现多民族文化，不论是日军边境屠杀现场飞来的俄国境内的子弹，还是日本侵略者对汉、朝两族关系的不断挑拨，都是作者对多民族文化的观照。

作者荡开大笔，将发生在琿春的事件在大容量、长篇幅、多人物、复杂情节和多重主题的长篇小说中反映出来。常勤毅认为，骆宾基已站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写抗日斗争，他兼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秉持着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当

两个故乡，隔着生死

骆宾基是山东移民的后代，父母日常生活中种种恋乡的情结必使他耳濡目染，留下烙印。1986年，读研究生的常勤毅叩响了位于北京前门西大街的骆宾基的家门，带着点儿山东乡音的骆宾基，看到河北移民后代、哈尔滨出生的常勤毅，一下找到了共同点。

可以说，移民身份是骆宾基文学世界的漂泊烙印，“海南家”是其中的关键词。“海南家”即渤海之南的山东老家。常勤毅说，《幼年》《乡亲——康天刚》《边陲线上》等作品中，“海南家”对游子们所具有的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令人吃惊。这条强劲而又神秘的看不见的命运之线，拴系在每一个游子身上，不管他们走得有多远，不管异乡多么富庶，最终总要“管叶归根”。

在《边陲线上》沦陷的小镇里，挣扎生存的山东移民同当地人不同，他们在遥远的“海南”有自己的家和根。此时的关东已非发财和实现梦想之地，他

们看似有另一个选择：摆脱这日益残酷的环境和异族统治下的奴隶身份回家。然而，事实却相悖，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又难以离开东北。

“自从离家到关东，心比天更高，命比纸还薄”，小说中移民们所唱的乡曲小调正是作者笔下刘房东、老张等各类山东移民的判词。嗜财如命、自私自利的刘房东被逼死前，就盼着“天老爷保佑吧，让刘强快些回来……回海南……一定回海南去”。贫苦的老张悲愤绝望地说：“我二十一岁‘闯关东’，十三年没有回海南老家了……我半年多没有给老娘汇钱……”

常勤毅认为，骆宾基在《边陲线上》中对“海南家”的浓墨重彩，不只为表达思乡之情，更为着两个故乡之间，隔着生死，隔着战火：一边是严寒的、残酷的亡国奴生活，一边是温暖的、和平的、有尊严的生活。对“海南家”的向往，正是对民族解放的渴求。

骆宾基：黎明晨色中插在远处巅峰的旗帜

本报记者 张晓丽

马

担提西交 TTYAO

云层隔绝了阳光，走在雨中的上海宛平路，仿佛走进了漫长时光。

1936年的这条街，应称为“汶林路”。南方的酷暑，叫人坐不住椅子，但19岁的骆宾基在这里度过了5个多月孤寂而闷热的生活。他用睡眠熬过白天的燥热，在漫长的夜书写遥远边陲。在那燥热的尽头，他的小册子也写到了尽头，那是边陲线上独有的景象：“黎明晨色中插在远处巅峰的旗帜，更有劲地在狂风吹袭中，庄严而勇敢地摇摆着，摇摆着，极其迅速地摇摆着。”

彼时的他，盼望着这本书成为那巅峰的旗帜。

兵

男主角，一直在成长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艺术是创造性格的工作”。常勤毅深有同感：“刘强、康天刚、邵浩然……瞧瞧这些刚强浩然的名字，你就知道骆宾基属意的男主角该有什么样刚强的性格。”

初识莺啼，《边陲线上》在人物塑造和表现生活方面，自然有它的稚嫩之处，但总归瑕不掩瑜。在常勤毅看来，骆宾基以九一八事变后为学生讲道德《最后一课》的小学老师白书泰以及身边许多参加抗日义勇军的同学的经历，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强者”的形象：具有民族正义感，心胸豁达，任何情况下都能自警、自省、自励、自觉抵制落后思想腐蚀的几近完美的壮志待酬的热血青年刘强。

“杀猪老关知道救国。我呢？……我不能这么的躲避在家庭的翅膀下过活呀！”“我不能让家庭的感情缚住了灵魂的自由。神圣的民族革命是同自己的呼吸一样的迫切和需要……人们全都投入这生命的洪流里，我可不能作——阻碍水流的山石……”机缘巧合下，富人子之、知识分子刘强毅然踏上了抗日救国之路。

面对“救国军”中的种种弊病，面对敌人的封

锁、瓦解，刘强努力寻找出路，他的自救、自我升华体现了作者对于“强者”的精神要求。义勇军弹尽粮绝时，面对要不要向朝鲜农民收粮食捐的问题，他思考：“那么我们为了这些人，就不收粮食捐吗？可是救国工作就必定垮台……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让人不可避免地联想到哈姆雷特那句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小说的高潮部分，投机、厮杀、叛变、呐喊……在各种声部的交响中，刘强唱响了希望之音，让众人在砍断将要捆绑他们的绳索中，看到了红色的旗帜……

“在骆宾基的文学世界中，刘强并不孤立，在康天刚、邵浩然的身上，都有刘强的性格。”常勤毅最欣赏《乡亲——康天刚》中“有月亮不摘星星”的康天刚，他身上有刘强那种“倔强”的性格，却不再是强者性格的简单重复，在命运极端凄惨的悲剧中，“到底没有俯首认命”，在“爱生活中最美的”追求中，完成了生命的超越。

这种追求，延续在作者身上，仍然是“有月亮不摘星星”的雄心。



骆宾基曾说：《边陲线上》是为抗战服务的一个具体例证。

制图 许科

专家支持

常勤毅，宁波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生导师，宁波财经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著有《骆宾基：时代与政治洪流里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范型》《骆宾基论》等专著。